

2017年世界广播日高峰论坛在沪举行

声音,是互联网下一个巨大入口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记者 张祯希

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局副主任马里奥·曼尼威克斯引用的一番话,激起众多传统媒体人的共鸣——“当‘破坏性技术’出现时,占据市场的传统行业其唯一出路就是自我颠覆。对于传统广播而言,移动互联网无疑就是“破坏性技术”。移动互联时代,当原有的传播逻辑被重塑,广播该如何与互联网共生共舞,从融媒体晋升为全媒体?”

昨天,2017世界广播日主题活动在上海举办,全球广播业重量级人物齐聚高峰论坛,分享广播媒体的创新案例,也探讨融合发展之道。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、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出席并致辞。

论坛现场,无线电在互联网上的专用域名“radio”正式启动。与之呼应的是,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预测:“到2020年,30%的网络浏览量都将是声音进入。声音,是互联网下一个巨大的人口。”

传统广播行业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风口。在业内人士看来,移动互联网为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,也为业界颠覆自身提供了契机,广播业只有改组机制机构设置、重构采编流程、进入技术支撑、优化人才结构,才有可能涅槃重生。

“车联网”带来挑战也促成自我更新

得益于日渐扩大的驾车人群,当传统媒介受到来自互联网的第一波冲击时,广播却依旧坚挺。然而在移动互联网塑造的“车联网”时代,“驾车红利”或许即将殆尽。

“车联网”来势有多凶猛?去年10月,原本只做视频内容的Facebook Live 头一次在平台中加入了音频直播,这被业界视为互联网“搅局”传统广播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而布局“车联网”市场,其实早就进入了各大互联网巨头的计划书:阿里与上汽正在联合打造互联网汽车,特斯拉与谷歌下一步也将推出无人驾驶汽车,这些举措都挤占了“靠车吃饭”的传统广播行业的生存空间。

当“车联网”这一“破坏性技术”高速驶来,广播业务从线性变为闭环,传播从同步变为异步,用户对对象变为核心,如何解围?胡正荣用“垂直化、场景化、云端化以及智能化”四大理念来概括广播借力互联网技术来实现自我升级的途径。所谓垂直便是在内容上做到专业化、精准化,并且通过数据分析将定制内容推送给最匹配的用户;场景化就是利用直播等手段,与用户即时交互,让广播除了行车陪伴外,渗透到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;所谓云端则是将目前各家广播新媒体所拥有的数据,整合成公共“云”进行更为高效的内容配送。

广播是一种将人与人联结到一起的态度

“目前世界上仍然有约39亿人没有用上互联网,广播电台仍是最方便的信息工具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,当地社区广播教授农民关于耕作的知识,提高农作物收成。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,广播也是救灾性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。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弗兰卡·拉鲁在论坛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数据。在业内人士看来,广播的终极意义是与人联合在一起,在媒体融合转型的过程中,“温度”与“服务”依旧是广播行业不变的立足点。

“全国各地的广播媒体正在越来越多地与政务、商务、教育、旅游等行业

“跨界”融合,加速了智慧城市、智慧社区的建设,也为听众以及更大范围的受众提供更加精准的个性化服务。”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王求说。这样的例子不少,近年佛山电台便推出了“自助声导游”项目,通过微信平台提供“伴随式”自助导游服务,解决了人们在自助游中无导游、无讲解的尴尬;郑州电台为了挖掘、抢救、保留民间老艺术家的绝技、绝腔,走进民间,搜集录制了8000多段唱腔,组成戏曲节目。听闻中国电台的服务理念,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电台编辑约翰·乔治·赛尔也分享了自家的经验,在德国,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很多,在电台中,会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20多种语言的节目,用来满足新移民的文化需求。

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大背景下,广播的服务性可以做得更好。一名广播人描绘了这样一种可能:用户第一次来上海,对于该吃什么买什么很困惑,如果将这个问题通过语音直播出去,再与地图功能相结合,获得既时的信息反馈。这种针对不同时间空间与不同个体需求的个性化服务,或许会成为广播服务的趋势。“未来的广播行业,也许不会再有发送者与接受者,而是形成一个声音的“分享圈”,进行信息的共享与情感的互动。”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副主任路军说。

“星期广播音乐会”奏响新春专场

欧洲30多家广播电台进行直播录播

本报讯(记者徐璐明)昨晚,作为2017世界广播日的系列主题活动,新春专场演出在上海大剧院奏响。演出将中国民乐与管弦乐结合,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嘉宾与上海市民共享了一顿中国风味的“音乐盛宴”。据悉,全欧洲有30多家广播电台对这场音乐会进行直播、录播。

广播的传播让这场音乐会的观众不再局限在剧场之内。也正因此如此,在曲目的选择上,不仅要“好听”,更力求外国观众也“听得懂”。旅法捷克作曲家克里斯托夫·马拉特卡创作的唢呐与乐队《上海》时隔十年再次在上海大剧院奏响。他通过对中国乐器和民间音乐元素的精心研究,把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与中国音乐元素相结合,从一个外国音乐家的视角来展示他眼中的中国。本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执棒,上海爱乐乐团演奏。中国音乐的代表作,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、管弦乐曲《春节序曲》、作曲家杨立青的二胡与乐队《一枝花》等独具中国特色的经典音乐也在音乐会上奏响,向世界各地的听众“讲述中国故事”。

走进古代文人的雅致生活

600余件历代书斋用具在沪展出

■本报记者 李婷

“带雨有时种竹,关门无事插花;拈笔闲删旧句,汲泉几试新茶。余堂净一室,置一几,陈几种快意书,放一本旧法帖;古鼎焚香,素麈挥尘……”这是明代文学家、书画家陈继儒笔下的古代文人的生活。时至今日,尽管生活方式已发生变化,但这份闲情逸致通过器物得以传承。正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举行的“兰室长物——历代文房具特展”,展出商代以来3000多年间的600余件文房用具,带领观众走进古代文人的雅致生活。这些融合了能工巧匠与文人雅士才智的智慧结晶,也是我国独有的文化见证。

文房不只有“四宝”

文房,泛指文人书斋中的器物,且大多是案几间袖珍玲珑的小件物品。其物虽小,却承载、记录、传承、弘扬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。本次展览策展人、著名篆刻家韩天衡说,民间素有文房四宝之说:笔、墨、纸、砚。其实不然,文房的品类丰富,早在南宋赵希鹄所撰《洞天清录集》中就列入了古琴、古砚、古钟鼎彝器、怪石、砚屏、笔格、水滴、古翰墨笔迹、古画等九项内容。到了明末文震亨所著的《长物志》,列入的实用文房用具就有数十种,此外还记录有文房清玩雅物若干,如香炉、茶盂、琴、钟、数珠、扇坠、镜、钩、钵、琴、剑、茶盃等。

本次展览的展品跨越3000多年文明史,让人们领悟到:文房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钟爱,不仅是因为它们有实用价值,还有其所承载的丰厚文化、艺术、史料内涵。可以说,曼妙精致的文房是文人雅士的挚友和伴侣。以砚台为例,文人墨客皆宝爱有加,昵称砚田。本次展出的砚台或端、或歙、或红丝、或洮河、或澄泥,必先严选其质,由砚工妙构巧作,精细入微,浑然天成。



元代黑漆嵌螺钿广寒宫图捧盒



明代剔红有盖葫芦壶

海上青年画家五人展周四举行

本报讯 由朵云轩艺术馆策划的“文心游艺——海上青年画家五人展”将于2月16日至3月2日在上海朵云轩举行。“依仁于游于艺”,本次展览以“文心游艺”作为主题,体现了主办方对于当下中国画的独特思考与追求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展览也是朵云轩成立艺术馆后,首次自主策划的年轻中国画家群体,反映了朵云轩对于海上年轻艺术家的支持与重视。朱忠民、顾村言、甘永川、牛孝杰、徐旭峰都是目前活跃在海上画坛的青年艺术家,他们虽作品风格不同,艺术追求各异,但是都对传统中国绘画的精神有着共同的体认,并且自觉地服膺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。(路文)

上大上海电影学院首开艺术表演系,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院长陈凯歌——

“我们被物质欲念腐蚀太久,是时候回归精神了”



上图:陈凯歌出现在上大宝山校区接受采访。右图:艺考生在排队候考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“怎样看待艺考那么热?”“怎么说呢,行业那么热,事实如此。”“怎样看待人文电影与商业电影在创作上的博弈?”“我赞同却也反感着一句话: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。赞同的是,倘若你无法与时代大致同步,就丧失了从事喜爱职业的可能性。我反对的是因为我反潮流,我不喜欢顺着走。”“怎样看待资本入侵后大量非专业的进入电影圈?”“天才拦不住,你还是别让我说得罪人的话了吧。”

专访中最敏感的三个问题,从不着痕迹、身段轻巧到直截了当,陈凯歌都第一时间闪避开了。或许,所有的小心翼翼是缘于此刻的他身份特殊——他不仅是当年那个说“中国电影人对自己狠一点”的导演,还是位传道授业解惑的院长。他选择用一颗教育者的心宽待电影的迷局。

昨天下午,陈凯歌出现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的艺考现场,来瞧瞧学院报考表演系的考生们。一同前来的还有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旭、电影学院副院长田壮壮和表演系首席教授奚美娟。他们面对的既是从2700余人缩减为20名新生的筛选题,更重要的是如何为那20名上大首批表演系幸运儿匡正脚下之路,因为这群人可能牵系着中国电影的未来。

正因关乎未来,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,陈凯歌在话里话外留足余地。可有一桩事,他说得斩钉截铁:“我们已被物质的欲念腐蚀太久,是时候回归精神了。”

“我所认为的中国电影最短的‘板’,是许多人迷失了‘为什么而做’的初心”

从上海大学宣布成立上海电影学

院的那日起,错位竞争的问题就萦绕于许多人心头。在学院的教学理念尚未完全披露时,学院艺考现场的画面却先一步揭开某种“错位”:别家的艺考现场,考生谋杀最多菲林,而在上大的电影学院,院长陈凯歌始终是焦点。这与众不同,直白却不无道理——陈凯歌是学院最闪耀的招牌,也可能是最大的财富之一。

他是导演,所以手握大好资源,并愿将资源分享出来。“我会跟我的学生们混在一起。”他本打算在新片《妖猫传》的拍摄中就带几名学生进组,无奈时间不匹配。但他承诺:“明年我的新片开机,一定会会有导演系、表演系或者其他专业的学生一起参与。”也正因经历过中国电影近40年的丰富历程,他深知,此地固然满目良机,但从业者多如过江之鲫却也多数寂寂无名。“行业热、艺考热,大家都来参与未必是坏事。但应清醒地意识到,行业远比想象艰难。”当年,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78级导演系时有老师问他,觉得班里多少人会成功,青年陈凯歌给出“三分之一”的估算,回复却是“全班28人能出3人,已是上算”。这是一个非置身其中不知艰难的笃定。就拿资本来说,外人都道是好物,但陈凯歌看到的是“难”,“忽略金钱,我们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,所以我不能自外于社会而清高地唱着‘我不需要钱’。但如果一味被钱操纵,你的意见就会变得无足轻重。”

所以,当身份切换为教育者,他愿去行业里的暗面,转而做学生们积极的光源。中国电影圈近来常陷争议,资本入侵、演员浮躁、从业者不专业等现象都让行业备受诟病。人们把脉时总会说“中国电影教育有缺位之处”,也曾有业界名家直言“中国电影亟需蓝翔技校”。这些观点被抛到院长陈凯歌面前,却得到了不同阐释:“我所认为的中国电影最短的‘板’,是许多人迷失了‘为什么而做’的初心”。如果所有的电影技能为“0”,那“为什么而做”便是“1”。

陈凯歌还记得自己做电影的初衷:“我所有的电影,都是有关爱。”他把自己的作品比作一封封“信”,那些信里“因爱而有了宇宙星际,四时有序,也因爱推动着社会进步”。居于电影学院院长之位,他之所以愿和学生们“混在一起”,更大的冀望在于,“望年轻人能暂时忘却名利,用心去感受剧组里对电影的无上热忱。电影,应该是通过感性的方式来传达人们所信仰的公平、正义、友爱等价值观,而非一无所有的。”

“我所希望的未来,是我的学生带着毕业长片回校园接受嘘声或掌声”

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,陈凯歌留过洋,因而外界对他的电影教学观,作如是展望——中西合璧。他点头:“我的学生既可编新亦能述古,英语必须好,中国的传统文化涵养也必须出色。我们会安排古典诗词课,也会让他们通读《古文观止》。”

可以想见,等今年9月,表演系的学生开课之后,他们会很忙。“现在有很多小孩以牺牲童年的代价考上了心仪的大学。可一旦踏入大学校园,仿佛人生60%的目的实现了,就松懈下来,变得懒散,美其名曰‘补偿性休假’。这是不对的。”陈凯歌说,“面对你即将展开的人生职业,大学才应当是所有教学阶段里,最忙的一段时光。”

他所说的“忙”,既有实践层面的。未来,学院的表演系、导演系、电影专业系、摄影系、影视编导等多门类学科专业将合纵连横,成立“联合作业小组”,从大一开始,每一组便是个小型剧组,从剧本诞生到后期制作,学生们将在电影实践中摸索出真知。而且,不同于多数影视院校把短片拍摄作为学生的毕业作品,陈凯歌希望,“我的学生能在毕业时就拍摄出长片作品”。

更多的“忙”,也许在于思考层面。前阵子,他读到一篇英文文章,“标题直截了当——‘好莱坞已死’”。文章称,“好莱坞极具创造性的年代委实一去不复返了”,很重要原因是他们从“上世纪七十年代以人物塑造推动电影发展,沦为今日以‘概念’统领全局”。“想想他们的辉煌时代,阿尔·帕西诺、罗伯特·德尼罗塑造过的那些重要角色,如今再也没有了,被无休止的续集取而代之。”在陈凯歌眼里,好莱坞的警钟值得中国电影借鉴,“相似的情况在国内大概就叫‘IP’吧。我不会反IP,但我主张:电影艺术之所以常在常新,是因常新所以才能常在。”

自称理想主义者,陈凯歌本人曾在对现实题材的探索中思考过这样的问题——电影可以怀疑什么,又推动什么?结论是“电影应该可以随着时间的演进,不断对人们曾经接受或习见的状态有所怀疑”,比如西方某些国家的婚恋观,就因为电影而起了天翻地覆的革新。又如,中国电影突飞猛进的现状,是以快速更新换代为代价的。这些变故,陈凯歌通盘接受:“现在常说中国电影导演已经到了冲破代际划分的时候,第五代渐渐无处安放。可我们为什么要偏执于那个年代呢?自然更替是规律,如同我们当年曾在一个时代取代了前辈一样,事实是,我们也会被年轻导演、被新的想法接替、承接。”

若一定要说过去的岁月还有哪里最值得怀想,那么30多年前的往事可算一桩。“曾经,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会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地带着毕业作品回到学校。他们很可能遇到突如其来掌声如潮。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传统。因为抛却面子,没有顾忌,那才是电影的本质与传统。”说这话时,陈凯歌的眼睛是晶亮的,这大抵也是他所期望看到的中国电影的未来。